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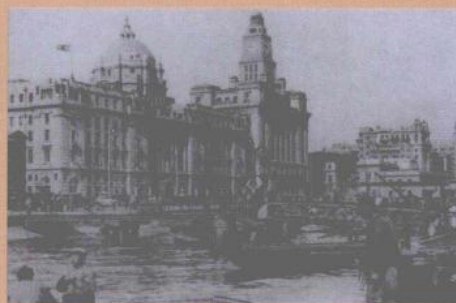
辛亥百年

上海市社联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丛书

整合主义的挑战

上海地方自治研究
(1927~1949)

周松青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整合主义的挑战：上海地方 自治研究(1927~1949)

周松青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上海地方自治始终受到整合主义进程的影响,而无法形成自主自足的发展,在形态上支离破碎,断断续续。主要表现为三种自治类型:区乡镇公所及保甲自治类型、参议会—参事会类型、以商会和《申报》为代表的团体自治类型。全书以大量详实的资料对三种自治类型作了细致分析,是对上海地方自治的系统研究。本书适合相关专业人士借鉴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整合主义的挑战: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27~1949/周松青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313-07724-0

I. ①整… II. ①周… III. ①地方自治—研究—上海市—1927~1949 IV. ①D69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035 号

整合主义的挑战: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27~1949)

周松青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5 字数:376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724-0/D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前 言

从事上海地方自治研究已经十有余年。大约是1996年春我读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当时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而苦恼,我的导师刘学照教授拿出一本他积数十年研究而积累的记载有各种精炼的选题的笔记本,让我从中择一去做。但我天资愚钝,均苦恼地摇头。于是,我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逸夫楼五楼的善本书库,开始在里面做有意无意的翻拣,终于让我看到杨逸、吴馨、陆文麓等人编纂的《上海市自治志》(民国四年)八卷本线装书,我开始认真翻阅,发现在清末民国初年的上海有这么一段历史,而这八卷本的线装书犹如这段历史的百科全书。当时想,如果将之作为选题做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将十分讨巧,首先资料比较充裕,不存在资料匮乏之虞;其次,如果想偷懒,也可以不用查阅其他资料,用这八卷本做资料写一篇硕士论文,基本够用,于是回来和导师刘先生商量。刘先生对弟子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要求向来严谨,但在选题和学术观点上却是分外宽容,他常常对我说,“做学问只要自圆其说,自证其理,就是好的研究。”这句话一直被奉为主臬,而在学术研究和观点的表达上颇为勇毅。刘先生听了我的选题设想之后,用他的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可以的”,鼓励我大胆去做。于是,此一定题便一发不可收拾,到本书出版,已经是我从事上海地方自治研究所出的第二本书,以自治为经纬,将1905~1949年的上海史全线打通。

关于上海地方自治研究存在一些困惑,翻遍海内外众多学者对这个主

题的研究,一般都会将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的题域限定在1905~1914年,即杨逸、吴馨、陆文麓这批参与自治者所编纂的《上海市自治志》反映的这个时段,而超出这个时段之外,学者们便避讳不及。如果我的检索没有疏漏,仅见李天纲教授在十三年前所撰的《1927: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一文。在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武教授聊天时,他也曾善意地提醒我,要研究这个时期上海有没有自治这一问题。这些师友的观点让我十分警醒,使我花出许多时间在理论上去探讨这个问题。恰在此时,本选题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的资助,更加坚定了我探索的决心。

相比于1905~1927年,1927~1949年的上海地方自治进程缺乏明晰的主线,地方自治淹没于整合主义的话语中,时隐时现,时断时续。无论历史进程受到什么势力的影响,整合主义则始终保持清晰的脉络,并对自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本书以自治与整合主义为分析框架,力图将这个断裂的充满波折的历史进程有效地纳入到解释体系中去。整合主义对地方自治地挑战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与调和是本书的主旨。关于自治,我把它界定为三个层面,即政治的自治、行政的自治和团体的自治。在1927~1949年的进程中,上海的地方势力以原生依附为纽带,在上海发起和实施了三种类型的地方自治:

第一种类型,是国民政府地方行政体系下建立的上海区乡镇公所自治类型,这种类型中包括了保甲。第二种类型,是最具自治意义的,它在初期以建议和咨询为主,并逐渐发展到具有一定的否决权的参事会—参议会类型。第三种类型,以上海总商会、《申报》等商业团体和实业组织为代表实施的团体自治类型。

从整合主义视角而言,区乡镇公所自治类型始终受到政府较高的控制水平,参事会—参议会自治类型受政府控制程度明显低于区乡镇公所自治类型,商业和实业团体市民自治类型在三种类型中受到政府控制的水平最

低。如果将上海地方自治的三种类型与自治的三个层面结合在一起,参事会——参议会自治类型和区乡镇保甲自治类型都属于行政的自治,参事会——参议会类型自主性高,市长对其控制程度较低,到后期时,参议员全部由选举产生,保持了对市政府较高的独立性。但是参议会还是不能划入政治的自治层面中,因为它只有提交、审议和否决政府议案的权力,而无制定法律的权力。区乡镇保甲自治类型,市政府对他们的控制程度很高,前期基本上采取委任制,后期区长的选举只是在区民代表会这样一个小的范围内举行,较易受到操纵。以总商会和《申报》为代表的市民自治团体,除了作为一个团体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外,还对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申报》以一个团体承担起几乎涉及所有公共事务的社会救助责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属于团体自治。

在资料方面,本书主要使用民国时期的报纸和期刊资料,其中许多专题性研究在学术界尚属首次,如《申报》读者助学金运动、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国民政府时期上海的区乡镇公所自治等。在本书的研究中,笔者大量借鉴学界同仁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感谢,并在文末的征引目录中一一列出。遗憾的是,由于出版规划和时间的紧迫,尚有许多优秀研究成果未及借鉴,这是笔者在本书完稿时,最感缺憾者。

周松青

2011年8月10日于沪

目 录

前 言

绪 论 自治与整合主义：一个分析框架	1
一、整合主义的内涵	3
二、原生纽带：自治对整合主义的温和挑战	10
三、自治的三个层面和对上海地方自治的初步判断	14
第一章 整合主义与上海经典自治的终结	18
一、国民革命背景下的整合主义	18
二、市政府对市乡统系的整理和经典自治的终结	20
三、工统会对工会的整合	38
四、结论	44
第二章 整合主义与上海市民自治	46
一、上海地方自治的筹备及未果	46
二、参议会—参事会—临时参议会	67
三、市民自治：商民协会对商人的整合及其失败	82
四、结论	104
第三章 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区乡镇公所自治	106
一、抗战之前的区乡镇公所	106

二、抗战胜利后的区公所	118
三、结论	139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上海的保甲建设	143
一、国民政府建政初期上海的保甲建设	143
二、汪伪时期上海的保甲建设	154
三、抗战胜利后保甲制度的建设	167
四、结语	188
第五章 四次全国性选举在上海实践的观察	191
一、1931 年上海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	191
二、1936~1937 年上海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212
三、1947 年上海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224
四、1948 年上海的立法委员选举	241
五、小结	244
第六章 《申报》与自治——申报读者助学金的视角	247
一、《申报》读者助学金运动的发起、宗旨、目标	247
二、《申报》读者助学金运动的总体概况	254
三、受助者要素分析	259
四、资助者的类型	269
五、助学运动的成绩	274
六、社会舆论的一般状况	282
七、《申报》自治的一个标本	284
第七章 光复之后的上海参议会:地方自治的中枢	288
一、光复之后的上海临时参议会	288
二、正式参议会的选举	295
三、参议会的职责和具体工作	310

四、为民请命的参议会	322
五、参议会与区政的互动关系	348
六、对参议会的检讨	357
 结 论	 361
一、破碎的自治及其成绩	361
二、上海地方自治的三种主要类型	368
三、整合主义与上海地方自治	373
 主要征引书目	 378
 后 记	 385

绪论 自治与整合主义：一个分析框架

1927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挥师北上，跨过长江，饮马黄河，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成长为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势力，各方军阀或率部来降，或作有限抵抗后弃甲投诚。同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启了一个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学术界有大量的研究和评说，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所关注的是，在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进程中，距离南京三百公里的上海，由一群上海人苦心孤诣经营的，饱受波折和煎熬的地方自治所受到的影响。上海地方自治之受到冲击，并不是肇始于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而是在1911年辛亥之役后，这种影响就开始隐现，后来显现为一个巨大的阴影，挥之不去，无可摆脱。那么，为什么要将1927年拎出来作重墨的叙述呢？有两个原因，其一，在笔者以前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中，对1905~1927年的进程已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分析，虽然存在较多的缺陷，但以笔者现有之功力局限，目前没有新的内容要发表。其次，1927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民党所倡导的国民革命开花结果，它以一个强大的政党为基础，以一套比较严谨的逻辑体系，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为统领，以及一支主要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的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军队，建构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强大的体系组成。而这个体系在三民主义的统领下，对以上海为代表的地方自治势力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为这股洪流所淹没，从而形成整合主义与原生情感之间的冲突。1927年之前的历届中华民国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比，前者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指导，也没有强大的政党基础，派驻地方

的政府有很强的军人色彩，他们秉持传统的中国地方政府模式，只管征粮和纳税，维系对地方的控制。对地方政府的建设乃至地方自治问题，没有思路，也无规划。而南京国民政府以其宪政理论为指导，有比较清晰的中央和地方建设规划，主导和左右地方自治的进程，地方自治势力完全进入国民政府的步调中，为国民政府的政治议题所牵制，进入到缺乏理想和目标，随国民党意识形态而起舞的时代。

然而，自 1840 年上海开埠以来，几乎在无政府状态下自由成长起来的上海商民阶级，经过近九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合商业世界竞争，推动经济持续繁荣的法则，这套法则确保当政府缺场或隐身的时候，维系商业世界的经营和商民阶级的利益。自 1905 年以来，或上溯至 1898 年以来，上海的商民阶级开始从商业世界拓展到自治领域，并将商业世界自律的经营法则与行政领域的自治原则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兼具上海公共租界自治精神和理念、上海的商业文化和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于一体的一套复合的体系。这套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培养了一批自治人材，在上海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股势力以李平书为代表，以强有力的“上海人”身份自我认同，以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为核心理念，为上海市政建设苦心经营，形成两个后果，第一，将上海华界打造成为在中国范围内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市政中最好的市政，几乎被所有有自省意识的中国人视为市政建设的榜样。第二，上海的自治势力茁壮成长，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权力版图之一的上海的重要力量，在 1927 年之前，屡屡为自治问题在全国掀起狂澜。^①

然而，1927 年对于上海地方自治历史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嵌入和阻断，国民政府借重国民党动员到社会基层的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整合主义浪潮，这股浪潮几乎对每一个阶层，每一种政治势力，每一种社会形态构成了影响。而距离南京三百公里远的上海，更是国民政府整合主义重点经营的对象，由此而形成了自治与整合主义之间的博弈。

^① 参见周松青，《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地方自治》，《近代中国》，第 14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

一、整合主义的内涵

整合主义由吉尔茨作了系统的阐释,是对新兴国家或统一进程中的民族国家有力的分析工具。吉尔茨认为,整合主义是指独立定义的、特殊勾画的传统原生群体聚集进一个更大的、更具弥漫性的单元之中,其暗含的参照框架不是本地情景,而是由新兴公民国家所包含的全社会意义上的“民族”,即民族国家和公民国家的统一进程。但是,新兴国家很容易被基于原生依附的严重不满所伤害。这种原生依附由密切的紧邻和亲属关系,特殊的宗教团体,说特殊的语言,甚至是一种方言,还有遵循特殊的社会习俗等组成。这些血缘、语言、习俗及诸如此类的一致性,被视为对于他们之中及他们自身的内聚性有一种说不出的,有时是压倒性的力量。而民族团结越来越不是通过诉诸血缘与地缘,而是通过诉诸含糊的、间断性的也是规范化的对公民国家的忠诚,这种忠诚或多或少由政府运用警察力量与意识形态规劝予以加强。但是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公民政治的传统非常薄弱而且对有效率的福利政府的技术要求也不被理解,原生纽带倾向于重复地、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是持续地被提倡,并广泛地被推荐为一个划分自治政治单位的界线。正是这种原生情感与公民情感之间的直接冲突,构成新兴国家面临的恒久困境。公民不满的发泄口往往是:合法或是非法地夺取国家机器。原生性不满反抗更深入,更不容易满足。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之间的紧张虽然可能得到缓解,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给定的”地方、语言、血统、外貌和生活方式,塑造了人们关于他们究竟是谁以及与谁的关系密不可分的观念,其力量源于人性中非理性的基础。一经确立,这种缺乏考虑的集体自私观念一定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卷入民族国家的不断扩展的政治过程,因为这种过程触及了如此广泛的事务。^①

杜赞奇在另一种话语体系中几乎令人惊奇地表达了与吉尔茨相似的观点,他说,“民族主义一般被看做一个社会中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性别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并把这些差异融汇到一个更大的认同之中。然而,即便此种融汇一时一地取得成功,但不同的自我

^① 克利福德·吉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303~367页。

意识群体对民族的构想和表达仍大异其趣……我们听到的不是民族一致而单调的声音，而是一群交互穿插的、矛盾的、含混的声音，彼此之间相互对抗、相互肯定、讨价还价。”^①与吉尔茨的表述略有差别，杜赞奇使用民族主义替代了整合主义，用自我意识群体代替了原生依附，但两个表述中的整合式框架几乎是一致的，即民族国家。

1927年的中国以北伐为主导，进入到一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整合主义进程中。杜赞奇认为，这个由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所产生的模式与把民族描写为一种统一的古代的实体逐步发展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集体主体的那种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国家就是用此种历史的叙述结构及复制历史前提的各种话语武装起来，试图要么消灭要么利用那些不属于其自觉理想的历史话语的观念（如民间宗教组织或秘密社会）。即使当民族历史并未受到挑战的时候，中央集权的国家话语的倡导者也已经破坏并埋葬了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他种道路。我们看到诸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类的民族主义组织是如何宣称国家拥有一个集体的民族主体，从而导致联省自治运动和封建——市民社会运动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衰亡。^②

由于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保持了完整的延续性，尤其是中华文化保持了良好的传承和对各民族强大的融合能力，而形成了在中国境内文化、习俗、语言、自我认同的相似性。因此，在整合主义进程中，受到原生依附的挑战不那么激烈。相反，国民党领导的整合主义进程受到另一种整合式进程的挑战，即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相同的框架下都试图建立以其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民族国家和公民国家，二者间构成激烈的冲突。但这不是本论题关注的题域。

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作为关注的焦点并力求促进民族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基本目标有三个：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这就产生了民族主义

① 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合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页。

② 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合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220页。

的定义：“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①国民党无论是在其文宣中，还是在其行为中，都将民族主义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国民党在蕴积力量，发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更是将民族主义作为最主要的价值准则来看待。

民族主义涉及国民党北伐的正当性，也涉及它强化对国家和地方控制的合理性，这一点与我们关注的题域密切相关。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座桥梁，将强权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外部世界与民族及其特定的观念、象征和情感的内部世界相联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赋予民族主义象征和运动以力量和方向。社会政治运动的诸目标不是由运动的行为或参与者所界定，而是依据其意识形态中的基本观点和原则来界定的。^②国民党发动的北伐战争提出了一个非常简洁直白的口号，来说明它的目的，即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将打倒军阀放在了第一位，将打倒帝国主义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是，无论是在野的国民党也好，还是建立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也好，在宣传中都将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放在第一的位置，甚至打倒军阀也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易劳逸直言，国民党的革命不是一个经济阶级反对另一个经济阶级的革命。那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它所要摧毁的是军阀和帝国主义，它所追求的目标是确立一种新而有效的政治制度。易言之，民族主义者们努力去恢复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民族自豪感和中国人民的安定。^③

民族主义在国民党中具有深厚的传统，1911年辛亥之役取得胜利后，孙中山以清帝逊位，轻易地让出总理大位，在孙中山的内心深处，将驱逐鞑虏放在第一的位置，其他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国民党此时秉持的民族主义是推翻清朝。姜义华先生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从族类观念向民族观念转变

①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10页。

②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3页。

③ 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7页。

的过程。^①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演讲时,将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②清朝被推翻之后,驱逐列强对中华的蚕食成为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新内容。罗刚认为,“国父尝谓民族主义为国家图发达与种族图生存之宝贝”,^③可谓深识孙中山之内心世界。孙中山在谈共和理想时,也不忘对列强的警惕之心,他说,“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所谓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理想的资质,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进取的气概……现在竟把我国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当作俎上之肉,如被饿虎取而食之,则将增加其蛮力而雄视天下。如果为道义之士所用,便足以用人道而号令宇内。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平民和人道的拥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呢……因此,我愿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而应时势的要求。”^④1920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将他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对象作了更清楚的说明,“我还将民族主义发挥一遍,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⑤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是他的民族主义掺入了太多的政治谋略,罗志田认为,蒋在北伐前的识见已明确意味着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的主观意识。这一政治手法在五卅运动后日见风行,但在几年前即已出现。^⑥这可能是蒋介石的政治弱点,但与孙中山相比也可能是他的优点,蒋更善于审时度势,是一个理性的务实主义者,在灵活的运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追

① 姜义华著,《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20~25页。

②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324~325页。

③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初稿》,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3页。

④ 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出版社,122~123页。

⑤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5卷,394页。

⑥ 罗志田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72页。

求更大的利益，蒋天生的政治嗅觉使他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民族主义概念的变化从更早期的 1895~1911 年间，在中国的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就已经出现，卡尔-瑞贝卡认为，“在这个时期，那些将构成中国语境中民族主义的逐渐浮现的概念正处在最迫切的和有争议的流变中。”^①

民族主义是国民党产生的根源，也是它发展壮大，获得认同和支持的源泉。杜赞奇认为，从历史上讲，民族主义独特和新颖的地方不在于认同形式或意识形态等认识论的范畴，而在于全球性的体制革命。此种革命产生出极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表述。这种表述能力如此强大，以致民族主义一般被看做一个社会中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性别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并把这些差异融会到一个更大的认同之中。^② 国民党是民族主义感召力和强大社会认同支持的最大受益者，胡适曾对此叹为观止，他说，“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③

意识形态宣传是国民革命有别于北洋军阀政府的重要标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存在于三民主义、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北上宣言等一系列文件中。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如果不同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或在其中施行霸权，任何阶级都不能长期地掌握国家权力。^④ 国民革命在 1927 年开花结果，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此之前艰苦的意识形态宣传有密切的关系。

约翰-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具有五种一般模式，这些模式将有助于取得政权并维系统治：

(1)合法化。统治关系被描述为正义的和值得支持的。一种典型谋略我们可称之为合理化，象征形式的产生者构建一系列理由来设法捍卫或辩解一

① 卡尔-瑞贝卡著，高瑾等译，《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8 年，8~9 页。

② 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合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7~8 页。

③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独立评论》第 18 号，第 9 页（1932 年 9 月 18 日）。

④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斯拉热沃-齐泽克等著，《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161，148 页。

套社会关系或社会体制，从而说服人们值得去支持。另一种典型谋略是普遍化，服务于某些人利益的体制安排被描述为服务于全体人的利益，而且这些安排被视为原则上对任何有能力、有意愿从中取胜的人开放。（2）虚饰化。统治关系可以通过掩饰、否认或含糊其词，或者对现有关系或进程转移注意力或加以掩盖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作为虚饰化的意识形态可能靠各种不同的谋略在象征形式中表达出来。（3）统一化。可以通过在象征层面上构建一种统一的形式，把人们都包罗在集体认同性之内而不问其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一项典型谋略是标准化、象征化。（4）分散化。统治关系可以不必通过把人们统一在集体中而建立起来，而是通过分散那些可能对统治集团造成有效挑战的人和集团，或者通过使潜在反对势力面向邪恶、有害或可怕的目标。典型谋略是分化——强调人们和集团间的区分、不同和分歧，这些特性使个人和集团分离。另一个有关的策略是排他，包括构造一个敌人，不论是内部的或外部的，它被描述为邪恶、有害或可怕，它被要求人们一起抵制或排除。（5）具体化。可以通过叙述一项过渡性的历史事态为永久性的、自然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过程被描绘为近似于自然的事物，从而掩盖了它们的社会与历史性质。^①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秉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在许多场合对三民主义发表演说，以宣传他的主张，后来被奉为圭臬。他说：“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②孙中山在讲演他的三民主义的时候是真诚的，虽然孙中山可能不是太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价值，但他的表述深得意识形态之精髓，他关于三民主义的解读非常符合约翰·汤普森关于意识形态模式的第一种模式“合法化”，即普遍化谋略，根据这项谋略，服务于某些人利益的体制安排被描述为服务于全体人的利益，而且这些安排被视为原则上对任何有能力、有意愿从中取胜的人开放。孙中山在解读三民主义的时候，将人民放在

① 约翰·汤普森著，高铨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67～74页。

②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8卷，572页。